

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

徐 静 徐永德

提要: 本研究基于2008年4—8月间对23名北京市贫困老人进行的生命史访谈,采用生命历程范式的视角探析了贫困老人的生命发展轨迹,并区分出6种不同的轨迹类型:整体起落/晚年上升;整体起落/晚年水平;整体起落/晚年下降;整体平稳/晚年上升;整体平稳/晚年水平;整体平稳/晚年下降。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 贫困老年人是异质性很高的群体,他们有着大为迥异的贫困形成与变动过程,并且,即便已至晚年,他们的贫困状况仍然按照各自的轨迹特征继续发生变动;2. 贫困老人陷入贫困的促动力大多根植在晚年之前的生活经历中,与晚年相联结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维持贫困状况使之难以扭转的维持力而非根源性的促动力,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贫困老人的“突发性贫困”与“延续性贫困”进行了区分;3. 与建国后急速的社会变迁相联结的非预期生命事件对于老人生命历程中贫困地位的流动型态具有非常强的诠释力;4. 本文梳理出5种生命事件与晚年贫困的关系脉络。

关键词: 老年 贫困 生命事件 生命历程

一、研究的源起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急速而又深刻的社会变迁,其中蕴含着林林总总的不利因素直指老年人的生存处境,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社会事实。有学者(乔晓春、陈卫,1999)表示担忧,鉴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以及老年群体的高贫困风险性,眼前这股令人瞩目的银色浪潮有可能会导致老年贫困群体的不断壮大。为了阻止该现象衍化成牵涉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的严重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已经起步。围绕着这一议题,根据关键词检索,1999—2007年载于相关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大约有1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与归纳我们发现,目前学界着重探讨的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老年贫困现象的宏观论述(于学军,2003a,2003b;王琳、邬沧萍,2006;杨菊华,2007);老年贫困群体的规模评估(于学军,2003a;王宁、庄亚儿,2004;王德文、张恺悌,2005;乔晓春等,2005;孙陆军、张恺悌,2005);贫困老人的特征量化分析(徐勤,1999;李若建,2000;孙陆军、张恺悌,2003;徐勤、魏彦

彦, 2005; 乔晓春等, 2006)。这些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 (1)侧重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上的量化研究, 而更进一步诠释性的质化研究还鲜少涉足, 尤其是基于实证调查的经验研究非常缺乏; (2)宏观思维倾向于将老年贫困群体视作有着相似属性与生活体验的同质群体, 从而遮蔽了该群体的多样性; (3)研究视角偏向于横剖面的“状态”图景, 缺乏纵贯性的“过程”观照。

在国际学术界, 贫困研究的新进展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老年贫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 贫困分析从生命历程范式中汲取灵感, 累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 德国学者雷瑟琳与雷勃弗莱德 (Leisering & Leibfried, 2001) 提出贫困生命历程观点的四项原则: 时间化、民主化、行动者和传记化。“时间化”强调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贫困经历具有多种不同的时间性形态——单次或反复经历短期、中期或长期贫困。该论点喻示着老年贫困形成与发展的多元轨迹性, 说明贫困并不是“一锤定音”的恒久性类别标签, 而是横贯整个生命历程的动态过程。这也代表了“民主化”的意涵, 个体作为积极的“行动者”可以采取主动的因应策略改变自身的生存处境, 创造性地调整自己的生命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 贫困是个体性鲜明的“传记化”生活体验, 而贫困人群则是异质性很高的群体, 这是宏大叙事所无法企及的层面。

立足于国内老年贫困议题的研究现状, 结合来自国际贫困研究的崭新思维, 笔者认为, 以纵贯性的视角建立本土老年贫困现象的诠释性观点, 将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任务。本研究力图突破国内既有研究的“静态”成规, 借鉴生命历程范式, 将贫困老年人的生活现状放置其生命历程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理解, 以质化、微观的研究路径来丰富我们对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 以期推动老年贫困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体而言, 本文试图解答如下命题: 这些贫困老人经由什么样的轨迹发展到当下的贫困状态? 致贫原因是什么? 在整体生命历程中, 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历史变迁在时间的河流中如何相互交汇, 形塑个体独特的人生轨迹?

二、老年贫困诠释: 从生命周期到生命历程

贫困研究的先驱朗特里 (Rowntree, 1901) 以其著名的“贫困生命周

期理论”蜚声学界,其基本论点是:个体在生命周期内贫困风险呈W型曲线变动,即儿童期、初为父母期以及老年期是生命周期中贫困风险最高的三个阶段。朗特里的“贫困生命周期理论”在确立老年贫困议题重要性的同时,也为该议题的探索提供了分析蓝本。在这一理论图式下,生命周期内“老年阶段”世代循环重复的生命模式(如生理特征、社会角色与关系、共同经历的生命事件等)成为探索老年贫困的聚焦。一种观点认为,晚年生理机能的衰退,相伴而生的各种疾病风险的增加与可预期的负面生活事件(如丧偶等)是老人陷入贫困的主要促动力(Holman, 1978)。但这种“责难老年生理特征”的诠释视角很快受到强劲的批判,被另一种受建构主义思潮影响兴起的“老年歧视主义”的论点所取代。该论点反对将贫困归咎于个体层面的纯粹生理性因素,而是强调社会结构的不足,即认为“社会系统对老年人的定型与歧视的过程”(Angus & Reeve, 2006)制约着老人的发展机会与可以掌握的资源结构,限制着其发展行动的自由,这才是导致老年群体贫困化及边缘化的主要因素(Townsend, 1981; Phillipson, 1998; Alcock, 2006)。

必须指出的是,“老年歧视主义”的诠释视角并不是生理因素无涉及论,而是糅合着老年阶段生理特征与社会因素的交互影响,即如果说晚年阶段的生理衰退是“绝对性”的“存在”,这种绝对性存在对个体生活或人生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形成何种结局,则取决于“相对的”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催化条件”。因此,生理弱势是否转化成经济地位的弱势要视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农耕社会老人的绝对权威与工业社会老人的“去价值化”便是佐证。尽管个体的生命发展带有世代循环的模式化印迹(如出生、读书、就业、结婚、生子、退休等),但在流变不居的社会变迁中,尤其是在错综复杂、变迁剧烈的时空下,一系列非预期生命事件的纷至踏入,个体生命发展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更为彰显,世代之间生命模式的差异性也由此扩大。在这种情形下,将生命发展拴在单线式链条上的生命周期模式,其不假思索的模式化思维以及生活场域的缺失,都决定了其在诠释老年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时的机械僵化与捉襟见肘。“老年歧视主义”论点的进步之处在于,它超越了生命周期模式“相同生命阶段的不同世代有着相似命运”的假定,将老人深嵌其中的社会文化场域和结构背景置于老年贫困解释的核心。但另一方面,它在内在逻辑上与生命周期模式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即过于倚重在晚年阶段内的探索(或称之“晚年阶段论”)。尽

管生命周期模式横贯了个体生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并没有在人生各个阶段之间建立横向的衔接,所能观照的仍旧是彼此孤立的、片段化的横断面图景,始终没有脱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条框。

“生命历程的连贯性”之说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青睐,在他们的研究中,“连续”而非“断裂”的视角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晚年的贫困被放置到个体的整体生命跨度内而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诠释。丹妮夫(Dannefer, 2003)的弱势/优势积累模型认为,随着年龄的推移,系统化的结构性力量会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喻示着老年贫困是横贯整个生命历程的弱势积累的结果,而非晚年阶段一朝一夕所形成。还有一些研究倾向于在个体早期的生活经历中探寻老年贫困的根源,个体教育程度与就业经历(McLaughlin & Jensen, 2000)以及重大生命事件(如参军、疾病、灾难等)(Crystal & Waehrer, 1996; Maas & Settersten, 1999; Davis, 2006)的影响是比较常见的探讨。这些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分析开辟了新的指引,但也存在局限:其一,对贫困的解释往往独倾于“个体主义”(将贫困归咎于个人原因)或“结构主义”(认为贫困源于社会结构的困境)的某一端。例如,弱势积累的论点忽视了个体在结构限制下的自我行动,而沦入结构决定论;对于重大生命事件与晚年贫困的关系探讨又局限于统计意义上的恒定性因果关联,其脱离具体社会情境的考察难免又陷进“个体主义”的解释。其二,研究注意力往往在宏观的整体层面,而微观的个体层面的研究非常缺乏。生命历程范式的出现恰能弥补这些局限,提供了更为系统、完善的分析框架。

生命历程范式于20世纪60—70年代由埃尔德创始,有四个基本概念与原则(Elder, 2003): 1. 时与空位。个体的生活轨迹植根于其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时期与地域空间。2. 相互依存的生命。个体并非独立存在,其生活镶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3. 生命的时机。生命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取决于该事件在其生命历程中发生的时间,发生时间之重要性甚至超越事件本身。4. 个体能动性。个体并非完全被结构所决定,而是即便受限于各种约束,仍藉由有目标的行动,选择性地塑造自己的生命历程。生命历程范式的核心观念在于,“社会机制与个体特质的交互影响所形塑的累积性作用力,将不同的个体带往不同的生命轨迹”(吕朝贤, 2006)。它与生命周期模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仅在个体生命轨迹上建立横向维度的衔接,并且在微观的行动者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间搭建纵向维度的理论桥梁。

生命历程范式历经 30 余年的发展, 逐渐为学术界所推崇, 成为主流研究范式之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此范式的关注亦愈来愈多, 出现了一些翔实的介绍(李强等, 1999; 包蕾萍, 2005), 以及基于此范式的实证研究——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一系列政治变迁(“文革”、上山下乡)、经济改革等重大社会事件对特定人群、特定生活领域的影响(郭于华、常爱书, 2005; 赵莉莉, 2006; 董藩、邓建伟, 2001)。但就笔者对文献的检阅, 该范式还没有用于探析老年贫困群体。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运用该范式来分析贫困老人的贫困形成与发展轨迹, 一方面为这一研究范式注入新的课题, 同时亦为社会老年学带来一点新的思维。

三、研究设计

(一) 访谈对象

本研究是北京市贫困老人质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笔者于 2008 年 3—8 月在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和石景山区进行了近 5 个月的定性调查, 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协助下, 接触并访谈了 31 名低收入老人。在寻找访谈对象时, 我们给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提出两项选择标准: 1. 低保户或者社区困难户的老人; 2. 认知清晰且表达没有障碍。其后, 我们采用目的抽样进行筛选, 尽量拓展访谈对象的多样性, 涵盖了不同社会、人口、经济背景的老人。首次访谈由居委会和社区工作人员陪同, 其后的历次访谈在电话中另约时间, 笔者单独前往。每名被访者的访谈次数在 1—5 次, 每次访谈时间 45 分钟至 7 个小时不等。所有的访谈均在被访者家中进行, 并且在征得被访者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只有 3 名被访老人拒绝录音, 采用了边访谈边记录的方式, 其余被访老人的录音资料都转成文本资料进行分析。在本次调查中, 有 8 名被访老人在第一次接触后拒绝继续参加访谈。本文是基于 23 名曾有多次深入访谈的老人的资料, 他们的基本信息如下: 年龄在 60—84 岁之间; 男性 8 人、女性 15 人; 丧偶 12 人、已婚 8 人、离异 2 人、未婚 1 人; 低保户 15 人、其余困难户 8 人; 2 人无子女, 其余有 1—5 个存活子女; 9 人从正式单位退休, 有退休金收入, 14 人仅做过临时工或者务家劳动, 无退休金。

(二) 生活史访谈

为了理解老人的贫困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他们对这一过程的主观诠释。在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叙事^①与生命轨迹线^②相结合的访谈方式。访谈开始,我们提供给被访老人线条示意图——生命轨迹线的方向(水平、上升、下降)与变化强度特征(平稳、波浪、跳跃)的组合,^③请被访老人在准备好的坐标轴上描绘出自己的生命轨迹线。访谈过程伴随着生命轨迹线的描绘而进行,我们鼓励被访老人边画边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在遇到人生拐点或者起伏的转折处,调查员就会询问当时是否有重大的生命事件,并且关注这些事件发生时被访老人的生理时间(年龄)与社会时间(当时的社会背景等),以及他们在这些事件中体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其选择与行动策略,并请他们讲述这些事件对于他们人生的影响,以及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我们认为,叙事与生命轨迹线相结合的优势在于:其一,能够更直观地呈现出老人贫困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其二,有助于探索老人对于重大生命事件对其人生影响的主观诠释;其三,生命历程范式中强调的“时机”能够在图中清晰地勾勒,我们能够将被访老人的人生故事放置于更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背景中理解,避免脱离具体社会情境而架空分析。

四、多元化生命轨迹特征

被访老人藉由生命轨迹线的勾画,将过去与现在串联起来,形成了持续的、有时间顺序的生命事件链,生命历程的脉络在他们的描画与自我叙说中逐渐清晰与丰富。在研究中我们发现,23名被访老人的整体生命轨迹存在着“平稳型”与“起落型”的明显分野,其中15名老人生命发展相对比较平稳,没有遭遇对人生造成沉重冲击的突发性事件,或者虽然遭遇个别负面事件但能成功因应,其破坏性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与降低;另外8名老人曾经历过重大坎坷或波折(如家庭生计负担者的

① 叙事意为以故事形式呈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

② 该方法受戴维斯(Davis, 2006)的启发。

③ 平稳、波浪、跳跃这三种特征中又可分为几个方向,即平稳水平、平稳上升、平稳下降,波浪水平、波浪上升、波浪下降,跳跃上升、跳跃下降。

重大疾病或意外死亡、政治运动的波及等)。此外,我们借鉴戴维斯(Davis, 2006)在个体生命轨迹方向的划分——上升、水平、下降来观察被访老人晚年阶段生命轨迹的发展,我们发现,虽然他们当下同处经济贫弱的生存境况,但却是处在通往不同方向的生命轨迹上:部分老人的生存境况正不断恶化(9人),部分老人已经趋于平稳(8人),而另外一些人则正逐渐摆脱贫弱的困境,处于向上流动的轨迹(6人)。根据整体生命轨迹特征与晚年轨迹方向两个向度,我们将被访老人的生命轨迹线归纳成6种类型(见下表):整体起落/晚年上升;整体起落/晚年水平;整体起落/晚年下降;整体平稳/晚年上升;整体平稳/晚年水平;整体平稳/晚年下降。这证实了,这些老人虽然同属“低收入老年群体”类别,但其当下经济贫弱的生存状况是经由多元化的变化轨迹而形塑的结果,并且他们将循着各自不同的轨迹方向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这一群体的复杂多样性远非一个类别标签“低收入老年群体”或者“贫困老年群体”所能涵括。

被访老人生命轨迹特征分布(23人)

整体轨迹特征	晚年轨迹方向		
	上升(人)	水平(人)	下降(人)
起落型	3	1	4
平稳型	3	7	5

(一) 整体起落/晚年上升

在这一类别下的3名被访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其生命轨迹线的重大起伏均与早年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重大历史事件(“文革”、上山下乡等)相关,并且他们晚年生活轨迹的持续上升一方面由于晚年阶段重大历史事件的“纠正”(补回户籍档案、知青回城),另一方面有赖于他们下一代社会与经济地位的改善。因此,他们在晚年阶段的贫困实质上是早年贫困的延续,我们称之为“延续性贫困”,并且这种贫困正随着重大事件影响力的消褪而逐渐削弱。我们以个案 Mang(生命轨迹线见图1)为主要案例来分析。

Mang, 男, 62岁(1946年生), 出生于贫困家庭, 全家仅凭父亲做人力车夫赚钱养家。1960年 Mang 小学毕业, 恰赶三年自然灾害, 被迫辍

生活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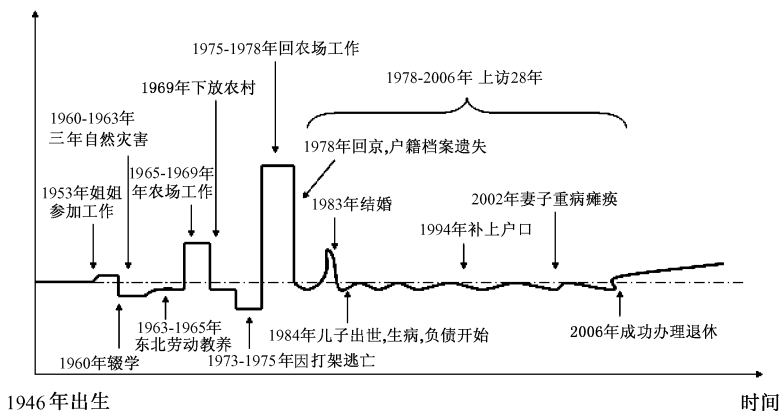


图 1 生活轨迹——个案 Mang

学在家。在灾荒年，面对生存挑战，辍学在家的 Mang 发展出倒卖粮票等各种非法生存手段。虽然这些生存策略短期内令他得以维生，但其行动策略却促成了束缚其一生发展的负面事件——劳教。1963 年，17 岁的 Mang 因倒卖粮票被遣送至东北某农场劳教两年。

Mang 出生的“时与空位”，作为其个体人力范围所无法企及的“先赋性命运”，它所决定的并不仅是 Mang 童年生活的贫困，而是像烙印一样伴随其一生，与社会历史进程相结合，对其一生的发展持续性地发挥作用。Mang 的人生故事为我们呈现出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变迁环境下，贫困对个体生命发展的钳制：其中首要的便是 1960 年灾荒年压力下 Mang 的教育机会被剥夺；随后在极度贫困的压力下，Mang 为了生存而发展出的非法谋生策略，不仅令他难以获得向上流动的人生机会，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政策环境）下，反成为他进一步深陷贫困的推动力。

1965 年劳教结束，按原政策本可返回原籍，但恰赶“四清五反运动”，劳教人员政策变动，Mang 只能就地参加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Mang 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但随即 1969 年出台的文件《劳教人员疏散管理》，Mang 刚刚稳定的生活受到波及，在政策安排下，Mang 被派往农村，生活再次陡然下降；1973—1975 年间，因参与一次集体斗殴事件而逃亡在外 1 年 3 个月，度过了一段“非人的生活”；1975—1978 年斗殴

事件平息后 Mang 回到农场,曾有过三年短暂的“富裕时光”——“一人挣钱一人花”;1978年政策允许返回原籍,Mang怀着“恢复正常生活”的心愿回到北京,却再次遭遇始料不及的事件——户籍及档案在调转过程中遗失,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年代,户籍意味着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等全方位生活资源获得的凭据。户籍档案的丢失使得 Mang 的生存与发展遭受严重的束缚,Mang 曾痛苦地表达:“在别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就看出改革开放提供的发展机会,但是因为没有户口,这些发展机会跟我无关”。

Mang 生命历程中一连串前后环环相扣的生命事件由贫困引起,也由贫困作为结果。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一系列贫困转化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作为媒介。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四清五反”、“文革”、严格的户籍制度等等)下,“劳教”这一经历以不可辩驳的力量改变了 Mang 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从“清白的正常公民”变为“四清五反”时期“地富反坏右”社会分类中的“坏”,以及1978年户籍档案遗失后生活于体制之外的黑户,在森严的户籍制度下遭受了各种发展制约。Mang 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得他的生命发展与社会历史事件的契合有着较之普通人更为敏感的特性。政策环境的风吹草动对 Mang 的个体生命发展都带来重大的人生沉浮。正由于 Mang 的个体发展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与政策环境的机缘契合(“不早不晚刚好踩着那个点”)——亦即生命历程范式中的“生命的时机”原则的体现,“劳教”这一事件给 Mang 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得以一直延续。Mang 由此感慨“生不逢时”,“我要不是生在这个时代,我的人生肯定大不一样”,这些感慨体现着生命历程所植根的“时与空位”以及“生命的时机”对个体生活经历的形塑。

个体生命发展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相互契合形塑人生轨迹的走向,在另外两个个案 Suo 与 Yu 的人生经历中也有明显的体现:Suo 与 Yu 的生活经历类似,都是回城知青,20世纪60年代初中毕业时恰逢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Suo 与 Yu 的生命轨迹就此被改变。她们在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时常常谈及留在北京的兄弟姐妹的发展情况,想象如果没有遭遇这一历史事件,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该如是,尽管90年代她们都携子女回城,但与在城里的兄弟姐妹相比较,心理落差甚大。

除了社会变迁大环境对于个体生命轨迹发展的形塑,从 Mang、Suo 与 Yu 的故事中我们还可以解读到另一面——积极的个体能动性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创造性调整:尽管 Mang 遭受着贫困以及各种发展制约,

但他并未被动地适应他的“被剥夺环境”，而是与他所身处的边陲地位做积极的抗争——通过多年上访以争取正当合法的身份，2006年成功办理退休后 Mang 终于有了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并且他积聚所有家庭资源投入对儿子的培育。2007年儿子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Yu 为了下一代的发展，提前办理退休回城，将儿子转学到北京。Suo 与丈夫离婚，携儿女回到北京，为儿女就业四处托人找关系，为子女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他们对下一代苦心栽培的策略在晚年阶段渐见成效，生活水平得到虽缓慢但逐渐的提高。

(二)整体起落/晚年水平

个案 Cai 是惟一该类别下的案例，与上一类别相似，Cai 的贫困根植于晚年之前的重大生命事件。从她的生命轨迹图(见图 2)可以看到，其生命轨迹线在中晚年时期因为两起重大家庭生命事件而直线下落，由此生活陷入贫困，但是由于 Cai 经年累月的积极应对并且随着政策环境的逐渐改善，Cai 近些年生活状况有所好转。

生活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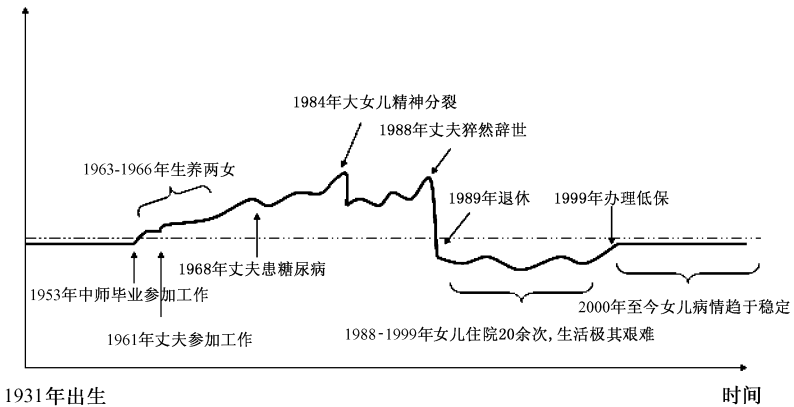


图 2 生活轨迹——个案 Cai

个案 Cai，女，77岁(1931年生)，中师毕业，曾是小学教员，1989年退休。Cai 生于农村，幼年时期因兄妹多家庭负担沉重。但 Cai 自幼学习刻苦，通过考学(中师)“农转非”并在城市就业。Cai 的人生轨迹本因

教育的获得以及职业的发展不断往上流动,但 1984、1988 年连续遭遇两起突发性家庭事件:正念大学的女儿突患精神分裂症以及丈夫的猝然去世,对 Cai 的人生造成转折性的深远影响。

生命历程理论的“timing”原则指出,生命事件对个体人生轨迹的影响取决于事件发生时个体或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同一事件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出现对个体可能会产生大为迥异的影响。有研究表明(DeMichele, 2009),偏离社会标准时间的生命事件因其“突发性”、“意料之外”、“疏于准备”往往对个体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丧偶”是女性生命历程中较为普遍的生命事件,历来颇受研究者的关注。“丧偶”的期望标准时间往往被认同在晚年阶段,而 Cai 的情况明显偏离了这一范畴。在她 52 岁、退休的前一年,女儿刚刚患病不久,在家庭经济需求骤增以及收入递减的情形下,丈夫突然去世。这几起突发性生命事件发生时机集中,交互累积,对 Cai 造成巨大影响,用她自己的话表述是“从云端一下子摔下来”、“人生不幸的根源”。

丈夫去世后,Cai 独自承担起照料女儿及女儿反复住院的昂贵医疗费。自 1984 年患病以来,女儿住院 20 余次,Cai 微薄的退休费远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开支。面对生活困境,Cai 到处托人介绍兼职,经由同事与朋友介绍,Cai 开始“没日没夜地打工”为女儿攒取医疗费。Cai 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女儿患病后的生活:“我像只蚂蚁,每天繁忙积攒粮食,大水一来,‘哗’一下就全完了,水走之后我再慢慢攒慢慢攒,水再来,又没了,我就是这样的情况。”Cai 的这段表述一方面体现了女儿的反复犯病给她造成的旷日持久的经济与精神压力,另一方面也呈现了其面对困境的积极能动性,她并没有宿命式地无力回应,正如自喻为“蚂蚁”,虽然力量微薄,但是始终顽强地持续抗争。连续十几年坚持积极的治疗,终于使女儿的病情得到控制。

1999 年,居委会主动帮她办理了低保。在 Cai 看来,“领上低保”已超越了“每月多几百块收入”的意义,而是有更深的含义——“希望”与“信心”。虽然女儿的病仍是生活的隐患,但是“政府关爱弱势群体”使其增强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自此之后,Cai 的生活开始有了起色。在对 Cai 的访谈中,她反复强调社会网络这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她克服困境的重要作用:“我能在困境中生存下来,除了我自身的坚强不懈外,还离不开周围好心人的帮助,党和组织的关怀,这么些年帮助过我们的人没有百,也有 50……他们给我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让我坚强地站起来，踏实地向前走。”从生命历程的另一重要原则“相互依存的生命”来看，一方面，与 Cai 生死相依的丈夫和女儿的生命事件造成了她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使得 Cai 后半生的生活轴心主要围绕着为女儿求医以及四处打工攒钱；另一方面，她在人生旅途中建立起的 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近些年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的逐渐完善，在她以“女儿治病”为主轴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助她较为成功地克服困境。

（三）整体起落/晚年下降

归为该类的老人都在晚年或临近晚年阶段遭遇一连串负面生命事件（丧子、重病等，还包括早年埋下的危机在晚年阶段的爆发）而身陷贫困并伴随衰老的步伐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纵览生命历程，该类别下老人的贫困大多属于短期的、局限在晚年阶段的“突发性贫困”。但由于晚年阶段年老体衰，老人应对突发性负面事件的能力（尤其是经济方面）受到制约，一旦身陷贫困，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困境。

我们以个案 Huang（见图 3）为主要案例来探讨该种类型的贫困，并借此阐述早年生命事件如何跨越时间而影响至晚年，以此进一步揭开生命事件与晚年贫困之间的复杂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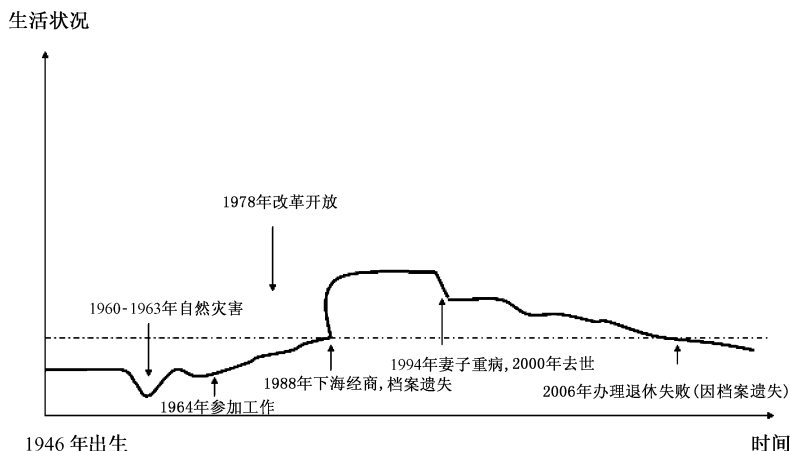


图3 生活轨迹——个案 Huang

个案 Huang, 男, 62 岁(1946 年生), 无退休金, 无住房, 与领取低保的母亲搭伙同住一间屋, 唯一的收入来源是 200 元的老人津贴。Huang 对自己的人生评价是“大起大落, 年轻时风光过一阵子”。他所指的风光是指在 1988 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及经济体制转轨, Huang 从工厂辞职下海经商, 生活曾有过很大的飞跃, “别人挣两三百的时候, 我就挣三四千了”。Huang 辞职时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工作档案遗失, 这段小插曲当年在 Huang 看来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但正是这个当时看来微不足道的细小末节, 伴随急遽的社会变革, 在制度安排与经济转轨衔接不够紧密的社会背景下, 却成为他晚年陷入贫困的机缘所在: 2006 年, Huang 到了退休年龄, 因为缺少工作档案无法办理退休, 从而没有退休金, Huang 曾经工作的企业在经济转轨中破产倒闭。Huang 对辞职这一决策及其所引起的档案丢失一事十分懊恼, “国企退休的那些老员工, 谁现在不是一个月退休金几千的, 这福利那福利的, 都比我强。但是当时是出来干工资高很多。但谁知道后来形势又变了呢, 这谁说得准。反正我就是倒霉吧, 要不是这个档案, 我怎么也有些退休金。”

Huang 这段人生经历让我们看到生命事件与生命历程轨迹之间的复杂关联: 其一, 当时看来无关宏旨的细节末端, 实质已潜藏危机, 随着社会变迁, 在碰触到特定政策环境的机缘下, 衍化成难以挽回的局面; 其二, 当年看来明智的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环境的变迁, 也有可能反而变成不利的举措。这也表明, 生命事件与晚年贫困之间并不存在恒定性的因果关联,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不能离开对生命历程所嵌入的社会历史变迁(时与空位)的观照。这一论点在 Huang 的另一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中同样可以体现出来。1994 年, Huang 的妻子患重病, 为解燃眉之急筹钱给妻子看病, 1996 年住房拆迁, Huang 选择了仅仅几万元的拆迁费而不是拆迁房, 而 2000 年之后房价的突飞飙升让本打算买房的 Huang 最终只能望房兴叹, 无奈之下只能同老母亲挤住一间房。Huang 生命历程中辞职、丢失档案、妻子患病及住房拆迁这几起事件累积着隐性的危机, 在晚年阶段遭遇特定的社会环境同时迸发, 致使生活不断走下坡。

早年的事件跨越时间使得老人在晚年阶段陷入贫困也体现在另一个案 Wang 的经历中。Wang, 家庭妇女, 无儿女。Wang 在 1989 年房屋搬迁时, 以侄子的口头承诺“养老送终”作为交换, 将房屋产权让渡给侄子。但当 2000 年丈夫去世, Wang 要求侄子履行承诺时, 对方却推托不

肯兑现。与个案 Huang 类似,这一生命事件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未必是立竿见影即时性的,但在特定的时间与情景下风险就会爆发。

除了早年累积的危机在晚年阶段的爆发,在晚年阶段突遭重大变故是老人突陷贫困的另一主要原因,并且,由于老人应对能力的限制,面临重大变故即便是在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下,也很难通过自身的能力有效应对。个案 Lin 在 2006—2008 年 3 年间遭遇一系列突发的灾难性事件:2006 年老伴脑溢血住院;2007 年 8 月儿子外出旅游溺水身亡,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孙子;2008 年女婿查出胰腺癌。虽然 Lin 在 2008 年办理了低保,但低保金在这一系列灾难面前对生活的帮助微乎其微。Lin 认为政府与亲友的帮助都是“救急不救穷”,自己年纪也大了,惟一的指望是孙子毕业参加工作后再慢慢走出困境。

(四) 整体平稳/晚年上升

“整体平稳/晚年上升”型的老人总其一生没有大的人生起伏,始终生活在相对贫困的境地,但进入晚年后,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下一代的职业发展)与政策环境的有利倾向,使得她们生活有所好转,并有望走出贫困。

个案 Zhang, 女, 76 岁(1932 年生), 丧偶, 家庭妇女, Zhang 对自己的人生评价是“苦了一辈子, 刚过上好日子”。Zhang 出生在封建意识很浓的家庭, 在性别歧视的环境中成长, 她描述自己在父母家的角色是“使唤丫头”。1946 年结婚后生活有了小幅度的改善, 但 1949—1958 年 9 年间 5 个孩子的陆续出世给家庭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一家 7 口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 生活一直难以为继。直到孩子们长大外出工作, 生活才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随即是 90 年代初席卷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5 个孩子都陆续下岗, 刚有改观的生活又开始走下坡路。2003 年丈夫去世, Zhang 失去了生活的主要依靠, 生活再度受到波及。但在访谈时, Zhang 对丧偶已经比较释然, 她认为那是每个人必然要经历的。丈夫去世后, Zhang 生活的主要依靠转向了 5 个孩子。2004 年, 居委会主动帮助 Zhang 办理了低保; 2008 年, 政府对未参加工作、无退休金收入的老人每月发放 200 元生活津贴。Zhang 在新旧社会强烈的对比中获得极高的幸福满意度, 坚信自己的生活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上升。

Zhang 的生命轨迹流动型态与朗特里(Rowntree, 1901)提出的“贫困生命周期模式”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初为父母期, 因家庭需求的增加而

生活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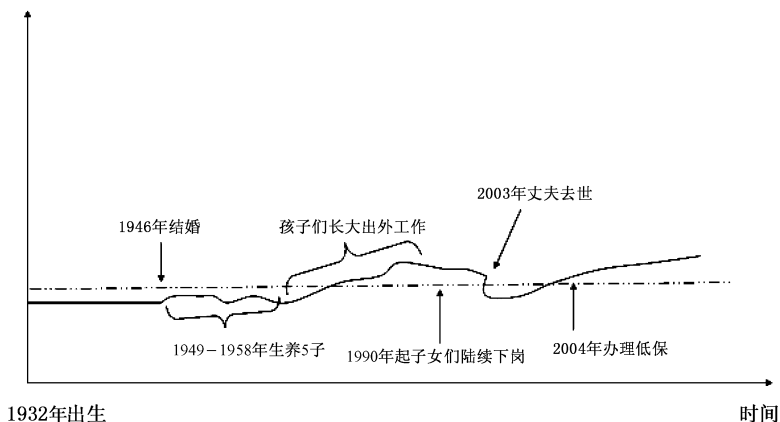


图4 生活轨迹——个案 Zhang

造成生活的艰难；子女逐渐长大就业后，生活水平得到缓慢提高。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迥异，其生命轨迹线又呈现出时代特色：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虽然 Zhang 没有直接参与职场，但因家庭其他成员的职业变化而使生活受到波及。此外，她晚年时期由于社会政策的干预，并没有如“贫困生命周期模式”所呈现的在晚年阶段遭遇生命轨迹的下降，这体现着社会政策在干预生命历程风险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社会政策的有利干预对晚年阶段生命轨迹的调整同样体现在该类别其他 2 名老人身上，她们与 Zhang 一样，都是丧偶的家庭妇女，享受政府生活补贴。

(五) 整体平稳/晚年水平

“整体平稳/晚年水平”类老人的特点在于，一辈子生活在生活水平较低的长期贫困中，一般而言，他们的家庭存在持久的压力源（如残疾、慢性疾病、家庭纠纷等等），但是通过各种因对策略，已与“压力源”达成平衡与平稳。我们用 Yang 的故事来加以阐释。

个案 Yang，男，64 岁（1944 年生）。Yang 出生于农村，幼年丧母，兄弟姐妹 5 人。在“记工分挣口粮”的年代，Yang 的家庭人口结构（劳动力少）让全家吃尽苦头。1976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Yang 的生活也水涨船高，但城乡差距依旧很大。

城乡二元身份的强烈对比使得 Yang 一心寻找摆脱农业户口与农民身份的机会,但在户籍制度森严、迁徙受到严格控制的年代, Yang 唯一想到的方式是“结婚”。为了离开农业,1986年(42岁)Yang 娶了北京城里双目失明的姑娘。“结婚”作为 Yang 发挥其能动性、力争向上流动的策略,也确实改变了 Yang 的人生走向,但却不是按照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因为妻方的家庭纠纷,结婚 10 年后 Yang 才“人户”迁至北京,到北京后 Yang 才发觉并不如设想的美好,在 90 年代城市大规模下岗的宏观社会背景下, Yang 的年龄因素(52 岁)加之在城市缺少根基(人际关系网络),使他根本无法获得机会进入正式的“工作单位”,只能做些零碎散工。另外,妻方房产纠纷的持续(1986—2003 年)让他陷在无休止的官司中,加之妻子残疾一直无法参加工作,生活水平非但未得到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迫不得已 2001 年 Yang 申请了低保,但 2007 年,儿子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低保又被撤销。在访谈期间(2008 年 4—8 月),因为儿子的收入低微无法担负起全家的生计, Yang 曾多次回到农村替农民打工,赚钱补贴家用。Yang 的叙述中还有很多内容是围绕着农村近些年的迅速发展与农民发家致富的。他无比懊恼当年“动脑筋”迁到城市,既没享受到农村的发展成果,也没能跟上城市的进程,一辈子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

生活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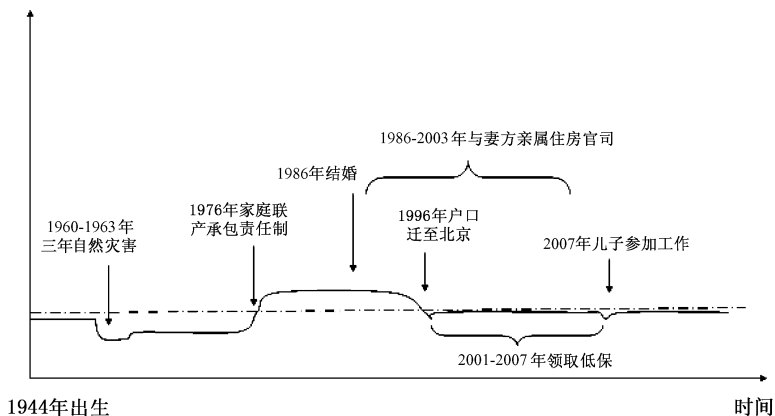


图 5 生活轨迹——个案 Yang

Yang 的“进城”经历再次鲜明地呈现出生命事件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复杂交汇。在决策时,个体运用的“理性”至多是在可预期的范围内作出最有利、最合理的选择,但是,在急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变革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生道路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某一事件或某一决策对人生发展到底产生何种影响也因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难以预料。Yang 晚年的贫困境地一定程度上与当年的决策失败(遭遇特定的社会变迁环境)有关,但我们并不能否定他为摆脱贫困生活所作出的各种积极努力,正如 Yang 自己所说:“这辈子我可没比别人少干活少受累,但老干不到点上,瞎忙活”。由于家庭内部长期存在的各种压力因素(妻子残疾、家庭纠纷、无正式就业),Yang 的各种努力只能将生活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状态。

(六)整体平稳/晚年下降

“整体平稳/晚年下降”类型包括一生徘徊于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的长期贫困状态的老人,并且晚年阶段由于年龄因素或晚年阶段可预期的负面生命事件(疾病、丧偶等)更添负荷,贫困状况进一步加剧。

个案 Wu,女,71岁(1937年生),调查期间(2008年4—8月)Wu 正四处打零工、七拼八凑地谋划生计,捡垃圾、当保姆、帮邻居做缝补等。Wu 无奈地表示,自从2002年丈夫去世后,她便失去所有生活来源,不得不走出家庭谋求生计。Wu 自幼梦想做一名独立的职业女性,1957年通过结婚从农村来到北京,希望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但1964年小儿子的出世打破了这一梦想,从1965孩子患上脑膜炎并留下精神病后遗症,到1989年意外死亡,24年间,Wu 不得不时刻照看他。家庭的责任与母亲的角色“像锁链一样”锁住了她出外工作的机会。小儿子去世后,恰逢体制改革大批人员下岗的浪潮,Wu 对做职业女性彻底失去信心,经济上只能一直依靠老伴的工资与退休金。2002年老伴的去世让 Wu 顷刻间失去主要生活依靠,而另外两个儿子,因为在1992年住房拆迁中的家庭纠纷,与母亲关系闹僵,几乎互不往来。老伴去世后,Wu 首先想到申请低保金,但却没有成功,原因是两个儿子都不愿意出具书面证明表示自己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赡养母亲。Wu 很无奈,儿子非但没能成为她养老的依靠,反使得她被排除在政府制度化的救济之外。在这种情形下,不得已 Wu 只能托居委会帮忙介绍工作。围绕工作问题,Wu 叙说了其中的艰难与屈辱。因为年龄缘故且无工作经历、身无

技能, 几年内只找到几次其他人不愿意干的脏、累散活, 甚至有些是不得不放下自尊让她感到尴尬的工作, 比如, 给男性老人擦洗身体。并且近期内体力的明显衰退让 Wu 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Wu 认为自己的生活正在走下坡路, 前景黯淡。

生活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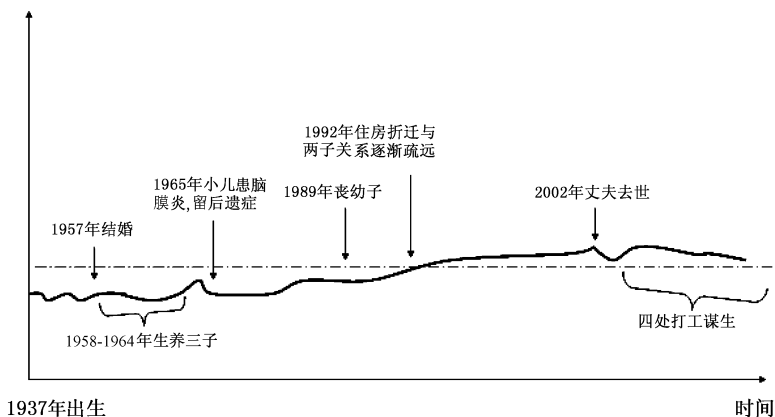


图 6 生活轨迹——个案 Wu

从 Wu 的叙述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性别角色对其人生发展的束缚。更糟的是, “家庭”并没有因为她在权衡之下做出的“牺牲”而在晚年(尤其是丧偶之后)给予足够的安全保障。尽管个案 Wu 与个案 Zhang 在生命历程中都是长期生活于贫困, 同在晚年时期丧偶, 同为家庭妇女, 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晚年命运。究其缘由在于, Wu 在其生命历程中长期建立起来的亲子关系惨淡, 以至在晚年失去子女的支持, 甚至因此而无法获得政府的救济, 只能依靠微薄的劳动收入维持生存。纵览 Wu 的生命历程, 家庭经济状况、性别角色、生命事件(小儿子患病, 以及住房拆迁作为导火索引发的母子关系恶化)形成持久的压力源, 令她的生活难以从贫困中解脱。在晚年阶段, 由于缺少家庭及政府的社会支持, 伴随着身体的衰退, 贫困状况将更进一步恶化。

五、进一步的讨论与结论

我们通过对贫困老人生命轨迹的分析认为：“晚年阶段论”所秉持的生理衰退与老年歧视的观点对于指向个体层面的老年贫困现象的解释力度不应被过分夸大。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其有重要影响，与晚年相关的因素（生理的或社会的）非常普遍地体现在被访老人的日常生活中，例如，个案 Yang、Wu 在寻找工作时所遭受的基于年龄的排斥与屈辱，以及部分老人因文化嬗变下代际之间权力关系的颠覆而在家庭内部承受着更多的剥夺（如个案 Wu）。但是，从对被访老人整体生命历程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他们经济贫弱的根源大多并非在此，而是肇始于更为早期的人生阶段。在我们深入访谈的 23 名老人中，归为“平稳型”的 15 人大多属于持久徘徊于低水平生存处境的生命历程贫困或者长期贫困，我们将其晚年的贫困称为“延续性贫困”。而“起落型”的 9 人中，除“总体起落 晚年下降”（4 人）类型，我们称其为晚年阶段的“突发性贫困”，其余陷入贫困的促动力均在更早的生活经历中，如个案 Mang 的生活困境根源于家境贫寒而失足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事件；个案 Cai 源于中晚年时期女儿患病与丈夫的猝然辞世，等等。因此，从我们所访老人的生命历程看，与晚年相联结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维持贫困状况使之难以扭转或进一步恶化的维持力，而非根源性的促动力。

我们还发现，被访老人的贫困生成机制与流动型态在高度动态的社会历史变迁中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性。这些被访老人出生于解放前物资匮乏年代，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急遽的社会变迁与改革开放后飞速的经济发展，其生命历程所植根的历史时空使得他们在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贫困性质发生着变化，最一目了然的便是从物质匮乏年代广泛存在社会中的普遍式绝对贫困转化为经济腾飞后的个别式相对贫困，相应地，其背后的贫困机制也在逐渐更换。建国以来急遽的社会变迁为个体的生命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生活机遇与危机，在被访老人身上我们发现，受中国历史变迁影响而造成的非预期生命事件在个体生命发展上的烙印深刻，对于他们生命历程中贫困地位的流动型态具有非常强的诠释力。例如，“上山下乡”对 Suo 与 Yu 人生走向的影响；“三年自然灾害”与“四清五反”对 Mang 生命发展的形塑；“20 世纪 90 年代体

制转轨、下岗浪潮”对 Zhang 生活的波及,对 Yang、Wu 寻找就业的束缚等等。从他们的人生故事中我们看到,“上山下乡”、“文革”、“三反五反”、“改革开放”并非空洞的历史性概念,而是印记在个体的生活轨迹上,成为跨越生命历程的累积力形塑着现在。另一方面,面对巨变的社会,沿循“习惯”、“传统”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被动摇,个体能动性对于生命发展轨迹的创造性形塑的重要价值更加凸显。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年代严格的行政控制过渡到自由灵活的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个体在自身生活轨迹的流动形态上有了较之从前更多的自主选择与发展空间,不同的主体性选择策略铸就了形态各异的流动过程。从被访老人的人生故事看,在贫困处境中习于苟安、缺乏进取精神的惰性文化少有存在,不论最终结果好坏,大部分老人都是横贯一生发挥其积极的能动性,与贫困处境作积极抗争,以争取更理想的生活。例如, Yang、Wu 通过结婚策略性的户籍迁移; Huang 在经济转轨中的下海经商; Mang、Suo 通过上访争取权益等等。我们的研究体现着,在中国近几十年来巨变的时代特征下,考察个体能动性与历史变迁的相互交汇对于理解晚年贫困的重要意义;鉴于建国后高度动态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不加思索地套用一些无法覆盖这些运作空间的贫困理论,是无法得到贴切于社会现实的诠释的。

本文透过生命历程范式几个核心概念(时与空位、时机、相互依存的生命、个体能动性)的穿针引线,对被访老人的生命事件与晚年贫困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生命历程范式强调“时机”为探索生命事件对人生影响之核心,所谓“时机”即是主体的生活世界与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契合点,联结着“时与空位”、“相互依存的生命”与“个体能动性”,意在为个体经历与宏大的历史变迁之间确立有机联系。首先,生命事件在特定的时机下产生,具有高度的时代性,例如,“上山下乡”事件对 Yu 的影响即是个体生理时间(1966 年高中毕业)与社会历史时间(1966—1968 年上山下乡运动)机缘契合的结果,而 Yu 的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因为毕业时间错开所受影响甚微。其次,生命事件也通过“时机”对其后的人生发展产生影响,例如, Mang 劳教结束后因为政治运动无法返回原籍; Huang 因为急需筹钱为妻子看病,在住房拆迁时选择拿钱而不是房,而随之而来的房价飞涨,让 Huang 购买住房的机会更加渺茫。此外,透过“时机”我们还能看到,生命事件在个体不同生命阶段出现亦可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原因在于,个体在生命不同阶段拥有不同

的资源与需求结构、不同的应对能力、不同的外部政策环境等等,并且同一生命事件发生在不同生命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可预期或突发性,这些都是导致差异的原因。例如,Cai、Zhang、Wu 都曾经历的丧偶事件。Cai 在相对较早的人生阶段丧偶,并且是在女儿身患重病、经济需求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丧偶的突发性对生活的创伤远甚于个案 Zhang 与 Wu; Zhang 在晚年丧偶,并且随即获得政府的救助,有利的政策环境削减了破坏性影响; Wu 虽也在晚年丧偶,但因家庭纠纷影响了 Wu 从政府获得救助资源,丧偶虽然没有造成立竿见影的重创,但生活水平在缓慢下降。“时机”的概念让我们看到,生命事件与晚年贫困之间并不是模式化的因果关联,要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脱离生命事件发生于其中的宏观社会背景与微观生命历程。

以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历史变迁的相互作用为分析背景,我们对于生命事件与晚年贫困之间的关联大致梳理出如下几种脉络。

1. 连锁传递: 某一事件虽当时没有造成破坏性影响,甚至短期看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遭遇特定的环境的机缘下却引发一系列的负面事件,使个体身陷贫困。例如, Mang 倒卖粮票→劳教→返回原籍→户籍丢失; Huang 辞职→档案丢失→无法办理退休; Yang 结婚→户籍迁至北京→无正式工作。

2. 持久作用: 某一负面事件的持续存在对生命发展产生持久的压力,使个体陷入贫困并且难以从贫困中脱离。例如, Cai 女儿的反复犯病; Mang 缺少户籍档案遭受长期的束缚; Yang 妻子的残疾以及与妻方亲属长久的官司纠纷等。

3. 交互作用: 独立事件之间发生交互作用后形成某种负面结果,如 Huang(妻子患病+住房拆迁→选择拆迁费而非拆迁房→无住房)。

4. 累积效应: 生命历程中几起独立的负面事件的累积影响,例如 Mang 自身发展受限与儿子、妻子重病; Huang 妻子患病与丢失档案、晚年无退休金; Lin 儿子意外死亡与老伴重病。

5. 削弱效应: 除了以上 4 种负面效应外,还有通过个体积极的能动性与外部有利的政策环境呈现出的有利于削弱晚年贫困的正面事件,例如, Mang 为争取合法身份而多年上访,以及对下一代的苦心培养; Cai 为了女儿的治疗费用退休后四处打工; Zhang 丧偶后政府给予办理低保以及其他生活补助; Yang 回农村打工,等等。

这些不同组合、不同脉络的生命事件链构筑了形态各异的贫困发

展与变动过程,并且伴随新的生命事件的踏入,老人的贫困状况还会出现新的波动特征。因此,本研究认为,针对不同贫困发展特征的老人,应该设计出区别化、针对性强的救贫方案,“统揽一把抓”的工作方针应该避免。面对有限的福利资源,对于贫困正在持续恶化的贫困老人应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对突发性贫困与延续性贫困的救助方式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前者,重点在于削弱重大突发事件的破坏性影响,以避免衍化成长期贫困;而对后者,大多是历史遗留的积债,如何妥善处理,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参考文献:

- 包蕾萍, 2005,《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董藩、邓建伟, 2001,《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中的三峡移民问题》,《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
- 郭于华、常爱书, 2005,《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李强等, 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若建, 2000,《大城市低收入老人群体状况分析》,《人口与经济》第2期。
- 吕朝贤, 2006,《贫困动态及其成因——从生命周期到生命历程》,《台大社会工作期刊》第14期。
- 乔晓春、陈卫, 1999,《中国人口老龄化:世纪末的回顾与展望》,《人口研究》第6期。
- 乔晓春等, 2005,《对中国老年贫困人口估计》,《人口研究》第2期。
- , 2006,《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特征分析》,《人口学刊》第4期。
- 孙陆军、张恺悌, 2003,《中国城市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人口与经济》第5期。
- , 2005,《中国城市老年人贫困程度的探讨》,《市场与人口分析》第6期。
- 王德文、张恺悌, 2005,《中国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与贫困发生率估计》,《中国人口科学》第11期。
- 王琳、邬沧萍, 2006,《聚焦中国农村老年人贫困化问题》,《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
- 王宁、庄亚儿, 2004,《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西北人口》第2期。
- 徐勤, 1999,《城市特困老人——急需社会保护的群体》,《人口研究》第5期。
- 徐勤、魏彦彦, 2005,《从社会性别视角看老年贫困》,《市场与人口分析》增刊。
- 杨菊华, 2007,《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问题的理论思考》,《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于学军, 2003a,《从上海看中国老年人口贫困与保障》,《人口研究》第5期。
- , 2003b,《老年人口贫困问题研究》,载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赵莉莉, 2006,《我国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生命历程——从中年空巢家庭的出现谈起》,《青年研究》第6期。
- Alcock, P. 2006. *Understanding Poverty (3r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Angus, J. & P. Reeve 2006 "Ageism: A Threat to 'Aging Well'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5(2).
- Crystal, S. & K. Waehrer 1996, "Later-lif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6).
- Dannefer, D. 2003, "Cumulative Advantage/Disadvantage and the Life Course: Cross-Fertilizing Age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8(6).
- Davis, P. 2006, "Poverty in Time: Exploring Poverty Dynamics from Life History Interviews in Bangladesh." <http://www.chronicpoverty.org/pdfs/2006ConceptsConferencePapers/Davis-CPRC2006-Draft.pdf>
- Davis, P. & B. Baulch 2009 "Parallel Realities: Exploring Poverty Dynamics Using Mixed Methods in Rural Bangladesh." CPRC Working Paper No. 142, Manchester, UK;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http://www.chronicpoverty.org/uploads/publication-files/WP142%20Davis-Baulch.pdf>
- DeMichele, K. A. 2009, "Memories of Suffering: Exploring the Life Story Narratives of Twice-widowed Elderly Women."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3.
- Elder, G. H. 2003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Mortimer, J. T. & A. Michael J. (eds.),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 Springer.
- Holman, R. 1978, *Poverty: Explanations of Social Depriv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Leisering, L. & S. Leibfried 2001,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United Germany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as, I. & R. A. Settersten 1999, "Military Service During Wartime Effects on Men's Occupational Trajectories and Later Economic Well-Being."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5(2).
- McLaughlin, D. K. & L. Jensen 2000, "Work History and U.S. Elders' Transitions into Poverty." *The Gerontologist* 40(4).
- Phillipson, C. 1998, *Reconstructing Old Age: New Agendas in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Rowntree, B. S.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Bristol: Policy Press.
- Sung, K. 2000, "Respect for Elder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ging and Identity* 5(4).
- Townsend, P. 1981, "The Structured Dependency of the Elderly: A Crea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geing and Society* 1(1).

作者单位: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行政学系
责任编辑: 张志敏

Abstract: B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ases in Southwest China, this article proceeds from the point of “field of Qi”, a special expression of emotions of Chinese, and studies the occurring mechanism of mass disturbances, which is a particular kind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ix layers of conformation of the “field of Qi”, on the base of which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two kinds of mass disturbances; one is the mass disturbance based on stakeholders, the other is based on non-stakeholders. In the end,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of mass disturbanc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bstract: Based on a series of biographical interviews with 23 people aged 60—82 in 2008, this article reports an in-depth study of life trajectories among low-income elder people in Beijing.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variety of trajectory patterns exhibit among those elders. With three directions in old age (improving, level and declining) and patterns over lifespan (smooth and fluctuating), their trajectories are categorized into six types. Case studies are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each type of trajectories. Elder’s life course paradigm is used in this study to analyze elder people’s life stories.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 (1) although all of the poor elders belong to “the poor” in current stage, they are not homogenous group since they have diverse processes of poverty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2) the causes of old age poverty are mainly rooted in previous early-lif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factors linked to late-life stage; (3) in Chinese context, the unexpected life events created under abrupt social transitions accounted much for the fluctuating of elderly people’s poverty trajectories; (4) five types of 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old age poverty.

REVIEW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surve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survey is to identify major research themes and activities on Chinese organizations,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the causal mechanisms identified in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We organize our survey by the disciplinary fields —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but we aim to contrast studies across these academic fields to highlight intellectual connections, bifurcations, or departures.